语图关系视野中文字的符号归属及功能再认识：《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的研究

Re-recognition of the Symbolic At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Writing in the View of Language-Image Relationship: A Study o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ing and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廖述务（**Liao Shuwu**）

内容摘要：索绪尔将语言与文字归属两个不同的符号系统。若要在视觉时代深入考察语图之意涵及关系，对索绪尔意义上的文字符号归属问题展开批判性反思就尤为必要。《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一书以对“音响形象”内涵之再解读为突破口，重构语言与文字关系，认为文字并非仅仅是语音的替代与补充，而是与后者共同构成语言的能指体系。以文字差异区分系统为基础，进而提出文学语言形象生成的全新机制。透过这一生成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文字和图像都具有德里达意义上的差异区分的中介性特征。对这一特征的深入探讨有利于进一步澄清学界反复争论的语图的实指与虚指问题，进而重置语图内在关系。

关键词：语图关系；文字；符号归属；中介性

作者简介：廖述务，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18ZDA27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Re-recognition of the Symbolic At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Writing in the View of Language-Image Relationship: A Study o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ing and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Abstract: Saussure attributed language and writing to two different symbol systems. If we want to mak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meaning and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image in the visual era,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make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attribution of written symbols in the sense of Saussure. The book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ing and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take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sound image" as a breakthrough, re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writing, and believes that writing are not only the substitution and supplement of sound, but together with the latter constitute the signifier system of language.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l syst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mechanism for the generation of literary language images. Through this mechanism, we can find that both writing and images have the intermediary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ces in Derrida's sense.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is feature is helpful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roblems of real and virtual reference, which have been repeatedly debat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n reset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of the language-image.

Keywords: language-image relation; writing; symbol attribution; intermediary

Author: Liao Shuwu, is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literary theory (Email: 372113651@qq.com).

在德里达看来，西方哲学传统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因为它始终如一地、教条地假定一个纯粹的、没有中介的"在场"时刻。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定义模式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言语是这种在场的特权载体，而文字则体现了这种在场的中介性与被延迟。德里达揭示了文字的"书写"特征，进而指出所有语言符号（包括言语和文字）都是以形而上学历史上仅赋予"书写"的中介性为特征的。[1] 德里达试图纠正索绪尔语音中心的偏误，因而彰显了言语与文字的同一性特征。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悬置了对索绪尔所谓"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索绪尔 47）展开进一步诘问的可能。显然，若要在视觉时代深入考察语图之意涵及关系，对文字的符号归属展开批判性反思就颇为紧要。赵宪章等人依循索绪尔有关语言与文字的区分，认为文学语言的形象生成主要依赖于"音响形象"的"语象"特质。[2]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关系研究》）一书以对"音响形象"内涵之再解读为突破口，重构语言与文字关系，进而提出有关文学语言形象生成的全新论断。

一

索绪尔有关语言与文字的区分是问题得以展开的重要理论前提。他认为，文字与内部系统无关，"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

1 See Arthur Bradley, *Derrida's Of Grammatology: An Edinburgh Philosophical Guide*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8) 41.

2 参见 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与可能"，《文艺研究》9（2014）：16-29。

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书写的词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47–48）。这意味着文字仅为“口说的词”（“声音符号”）的“代表”，亦即后者的补充和替代。索绪尔对“口说的词”进行了一种语音层面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重要的是能指如何呈现在我们的意识面前，而不是它与实际声音之间的任何关系。[1] 这个语言能指就是“音响形象”，它“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声音，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迹”（索绪尔 101）。在索绪尔这里，文字与“音响形象”相对举且从属于后者：“语言中只有音响形象，我们可以把它们译成固定的视觉形象”，“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索绪尔 37）。文字外在于语言系统，是音响形象的“视觉形象”与“可以捉摸的形式”。

依索绪尔所言，文字不过是“音响形象”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与语言的能指无关。国内一些代表性理论家意识到，要反思“文字”的符号归属，就必须对“音响形象”重释与再概念化。赵宪章重新界定“音响形象”意涵，认为在口语范围内，它表现为“语象”或“语言图像”和意义发生联系；而在书面语的范围内，文字文本图像作为语言能指，表现为“有声图像”和意义发生联系。文字文本图像须还原为“音响形象”才能使它的意指最终实现。[2] 这里虽强调了文字的能指属性，但它依旧是“音响形象”的标记。有学者发挥了上述观点并做了适度修正，认为维姆萨特（W. K. Wimsatt）的“语象”、维特根斯坦的“词语充当了图像”，都与索绪尔的“音响形象”一脉相承。“音响形象”就是和语音勾连在一起、被语音所唤起的语象。而文字作为“视觉形象”则把“音响形象”这种心理图像、内视图像予以外化和摹仿。[3] 可见，赵宪章等人虽然意图将文字能指化，但它依旧依附于“音响形象”。

《关系研究》对“音响形象”内涵的重释走了不同的路径。它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音响形象只是语音能指的心理层面，无法与能指划等号。赵炎秋敏锐发现索绪尔相关论述含混之处。索绪尔强调音响形象的心理性质，并认为“所指和能指分别对应概念和音响形象”（102）。但他同时指出：“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这一点只有经过一种抽象工作才能做到，其结果就是成了纯粹心理学或纯粹音位学”（157-58）。这一“抽象工作”反证不能分离的正是物质的声音和它所表达的思想。索绪尔强调音响形象并没有否认语音的物质性。从逻辑上说，必先有声音才能有相应的心理印迹。因此，作为语言能指的语音应包括物质层面的声音和心理层面的

1 See Arthur Bradley, *Derrida's Of Grammatology: An Edinburgh Philosophical Guide*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8) 66.

2 参见 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文学评论》2（2012）：88-98。

3 参见 赵敬鹏：“再论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艺理论研究》5（2013）：158。

音响形象两个部分。[1] 音响形象无法与能指划等号。其二，音响形象只是语音的一个次要组成部分。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以“音响形象在心理上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164-65）。《关系研究》将这一观点进一步明晰化：

> 一个词的声音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段，这个音段的两端以这个声音与同一语言中的其他音段的区别为界限。在这个音段内，发音者发出的声音可以有‘不同的素质’，换句话说，只要是在这个音段的范围内，发音者不管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都还是这个词的声音。索绪尔说的音响形象实际上就是这个音段在人的心理上的印迹，它与具体的人所发出的实际声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145）

虽然音响形象是公众对于语音的心理印迹，但无论从总体还是个体看，语音的心理印迹都是与实际的语音相符并由实际的语音决定的。也就是说：“语音的两个层面中，物质层面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先有了语音的物质层面然后才有心理层面即音响形象，心理层面是随着物质层面的变化而变化的”（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148）。

上述分析表明，语言听觉形式的能指是语音而非音响形象。那么，文字是否仅仅是语音的“代表”（能指的能指）呢？《关系研究》以汉字为例指出，仅靠语音，即使加上不同的语境，也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差异，使这些不同的词得到清晰的表达。汉语中众多的音段之所以不再继续分化，是因为它们与不同的文字联系起来，因而提供了足够的区分所指的手段。文字参与了语言的差异系统，使其区分更为精细。而且，没有文字的语言很难发展成为成熟、复杂、精细的语言。只有在文字的参与下，语言才能更好地留存、积累、展开，并在此基础上渐趋精细、复杂、丰富与优美。[2] 显然，文字并非仅仅是语音的替代与补充，而是与后者共同构成语言的能指体系。在此基础上，《关系研究》进一步探究这两者在语言系统内的关系。尽管从历时的层面，语音与文字的关系是变化且不稳定的，但在共时的层面，两者的关系是任意的，是一有机的统一体，所表征的意义与所指也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比之于直线展开、随时间消逝的听觉形态的语音能指，视觉形态的文字能指能在平面展开、可在时间中停留，更便于深度理解与阐释。正因此，《关系研究》认为，“文字不是外在于语言的另一个系统，它就在语言之中。研究语言与图像的关系可以通过研究文字与图像的关系进行，研究文学也可通过研究文字进行”（170）。

---

1 参见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143-148。

2 参见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152-154。

二

文学语言的能指系统影响且最终决定文学形象的生成。理论家对文字之符号归属的不同判定——是否属于语言能指系统，自然将直接影响其对文学语言形象生成机制的认知。

赵宪章、赵敬鹏等人认为，文学语言的形象生成主要依赖于“音响形象”的“语象”特质，而与文字的能指属性无根本性关联。赵宪章认为，语言是实指的，但借助隐喻修辞，语言就获得了类似图像的虚指性：“既然图像的隐喻本质导致图像的虚指性，那么，语言的隐喻也就意味着导致语言的虚指性，即语言符号脱离它的实指轨道而滑向虚指空间——由‘语象’所图绘的虚拟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诗的世界、文学的世界，整个语言艺术的世界。”（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95）显然，语言的图像性来自“语象”，即音响形象的表现。文学语言的形象生成最终以类似图像生成机制的“语象”机制为前提。这一分析有两个不足：其一，它是对音响形象类图像机制的抽象分析，忽视了这一心理层面的能指系统更内在也更本质的立足差异的意义生成功能。其二，“隐喻”修辞不是生成文学语言虚指及其形象性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很多隐喻性词汇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被任意化，逐渐具有实指特征，其隐喻义也就转化成了本义。[1]

音响形象作为语音能指的心理层面，在面对现实的文学客体时，其能指意义生成要以音段的听觉差异为前提。听觉能指因其线性时间特征，具有临时性、易逝性等不稳定特征。正因此，《关系研究》选择文字这一视觉形态能指系统作为分析文学形象生成机制的基本载体。也就是说，《关系研究》在讨论文学形象生成问题时，文学语言与文字具有等义性，可互为替换。不过，文学语言（文字）要建构文学形象必须要解决黑格尔提出的语言学难题：“诗人所给的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名词，只是字，在字里个别的东西就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因为字是从概念产生的，所以字就已带有普遍性”（黑格尔，《美学》213）。因此，“我们把我们所意谓的一个感性存在用语言说出来是完全不可能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66）。《关系研究》从两个层面来处理这一难题。首先，语言并不是绝对一般与普遍的，它既有普遍一般的一面，又有具体特殊的一面。语言由词构成，词的核心是词义，词义的核心是概念。概念是从若干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在保持抽象意义的同时，它又与个别具体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而且，人们理解概念总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而这些生活经验总是感性具体的。在理解概念的时候，人们必然把这些感性具体的东西与概念联系起来。不过，“语言虽然有具体特殊的一面，但在一般语言中，这一面还是次要的，比较模糊、混沌的。因

1　参见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121。

为语词首先是以它的共义为人们所把握的。另一方面，它虽然联系着个别具体的事物，但这个个别具体的事物还不是以其全部的清晰性与之联系着，而只是以与词义相应的大致的表象”（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176）。

值得注意的是，赵宪章也很关注语言本身所含有的与对象世界感性形式相关的因素。语言的隐喻意味着语言由实指符号变身为虚指符号，即语象虚指。“语象”作为语言隐喻，是语言由实指滑向虚指的符号变体。他还曾指出，语言所指（意义）与其对象不是任意关系，而是直接性关系，“这‘直接性’就是‘身体与可感者的天生的组合’，即大脑表意作为语象肉身与对象世界的天人之合，恰如图像以其相似性对于自然的认同与回归”（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与可能》21）。尽管将“语象肉身”与对象世界做直接性对应并不妥当，但赵宪章无疑充分认识到语言自身的“图像性”特征。而这正是语言再现外部感性世界的内在前提。问题在于，“语象肉身”还只是赵炎秋所谓的“一般语言”，它主要存有的依旧是语言“共义”的一面。可以说，“语象肉身”是文学语言形象生成的一般前提。

正因此，赵炎秋特别强调“一般语言”的“共义”与语言具体特殊的一面所构成的张力关系。那么，如何处理这一张力关系呢？这一内容正构成了《关系研究》应对黑格尔语言学难题的第二层面。前述第一个层面更多关注语词的基本语义层次，强调语言有具体、特殊的一面。在此基础上，要把语言中比较次要、模糊的具体、特殊的一面放大、突出出来，使它变得清晰、具体、明确，就需通过语词序列即语词的系列组合来进一步凸显语言的具象性维面。[1] 这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其一，语词组合加强语词具体特殊的一面。通过组合的方式，语词具体特殊的一面得以叠加、放大；或者，通过语词间相互限制，语言所唤起的具象的泛指性逐渐缩小。这两者将导致语词具体特殊的一面凸显出来，成为主导性的一面。其二，语词组合造成言语“偏离”。一般语言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但在具体语言活动中，当词义变化超出语词能指与所指之间确定性联系时，言语偏离就产生了。它会造成新异性，恢复人对事物具体感性一面的认知。其三，语言组合能形成一定语境，使处于这一语境中的字词句特殊具体的一面突出出来，使抽象变成具象。[2] 语词的组合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了完整的具象。但形象不等于具象的累加，它是由具象构成的一个新的有机体。它以具象为基础，但又有新的品质。

三

透过文学语言（文字）的形象生成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文字和图像都具

1 参见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176。

2 参见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176-179。

有德里达意义上的差异区分的中介性特征。对这一特征的深入探讨有利于进一步澄清学界反复争论的语图的实指与虚指问题，进而重置语图内在关系。

赵炎秋察觉到“一般语言”的“共义”与语言具体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并主张通过语词序列即语词的系列组合来解决具象的深度生成问题。不难发现，任何一个特定的“语词序列”在具象的生成上都具有不确定性。赫希（E. D. Hirsch）等理论家就曾注意到，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理论兴趣源于一个普遍的概念，即语词序列有一系列语言学上可能的意义（Steven Knapp and Walter Benn）。上述凸显具象性的语词组合的三种方式，其实就是语词序列通过语言差异区分系统进一步明确语义具象性意涵的方式。应该说，《关系研究》一书在讨论文学语言的形象生成机制时，虽然注意到了语言差异系统，但在论述中并未一以贯之。这尤其体现在从具象到文学形象这一关键性过渡阶段。具象是语象围绕某个共同点形成的能够表现一个相对完整生活片段的共同体，它构成了文学形象外在的感性表现形态。参照罗兰·巴特符号消耗理论，《关系研究》一书认为，文字处于第一级符号系统，形象是第二级符号系统。在形象中，构成形象的文字的能指和所指一起转化为形象的能指，然后这能指再与形象的所指一起，构成新的形象。文字的能指与所指在构成形象的过程中耗光了能量，满足于作为形象的能指而存在。[1] 这一论述具有重要理论启示，但未深究符号“耗光”能量的具体机制。其实，具象间的运作类似语词序列的差异化组合，它不是以具象自身的“积极”意义而是以差异区分方式最终确定形象的意涵。形象是众多具象（系统要素）作为关系项差异化重组的结果，形象意义的确定是以具象自身积极意义的消逝为前提的。这种从具象到形象的彻底转换表明，形象并不直接在场，是文学语言差异性区分的产物。

如上论述表明，从一般语言到形象的生成，文字系统的差异性区分功能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德里达意义上，这充分体现了文字的中介性特征，任何语词的意义都是由它与系统内其他语词在语音和概念上的差异而决定的。文字并不是形象的直接在场。或者，通过文字并不能直观形象。这个复杂的语言文字系统（以任意性、差异性、惯例性为特征）正是我们体验语言之外世界的中介前提。[2]

值得关注的是，“音响形象”的形象生成机制是否也体现出中介性特征呢？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复杂得多且充满争议性。在谈到文字的影响时，赵宪章认为文字作为“图像”能指并非如“音响形象”那样出自人的天性，而是人为的。[3] 也就是说，音响形象是自然与天性的。前文论及，他所谓的“语象肉身”

1　参见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209。

2　See Arthur Bradley, *Derrida's Of Grammatology: An Edinburgh Philosophical Guide*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8) 41.

3　参见 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文学评论》2（2012）：89。

也带有自然性特征。它与对象有直接性关系，是大脑表意作为语象肉身与对象世界的天人之合。为此，他做出一个重要类比：这一直接性关系就如图像以其相似性对于自然的认同与回归。在赵宪章这里，图像性虚指是以自然相似性为前提的。在这一点上，音响形象与图像有着共同的特征。而《关系研究》认为，音响形象是具有差异区分意义的“音段”在人心理上的印迹，不同于实际发音。一个词的声音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段，这个音段的两端以这个声音与同一语言中的其他音段的区别为界限。在这个音段内，发音者的声音可以有“不同的素质”。[1] 这也就意味着，音响形象要达成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词语充当了图像”，就需通过音段的差异性区分而不是通过与对象世界的自然相似性来完成。《关系研究》反复强调音响形象是特定共同体对于语音的心理印迹，就进一步强化这一概念的任意性与惯例性特征，而这些恰恰是音段差异性区分的语言学基础。

《关系研究》虽然意识到实际语音对于音响形象历史变迁的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将音响形象的形象生成认定为一种类图像的相似性机制。不过，在处理图像自身的意义生成机制时，依旧陷入到了有关实指 / 虚指的二元对立窠臼中。该著强调了文字的中介特性，语言符号是人为的，它们与自然的“感性存在”没有一致性。而图像的媒介是人们能够用感官把握的线条、色彩、体积和影像，它们与自然的“感性存在”是一致的，由它们构建的艺术作品，其能指与自然的表象有着同构性与一致性。[2] 这与赵宪章将音响形象视为“语象肉身”进而强调其自然性有着近似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图像因其直观性见证形象世界的直接在场。

其实，图像在表征世界时也带有鲜明的中介特征。我们可以中国传统绘画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以形写神、拟态传神。画家笔下的“形”并非物质性形式本身，而是对后者的一重抽象。赵宪章认为，空间造型和光色调配是图像符号最基本的工艺手段，而且“任何图像都是眼睛的存在物，任何人为图像都要迎合感知机制的需要，只为人的眼睛而存在”（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92-93）。这充分表明，图像具有非自然性的意义生成特征，但赵宪章将图像的这一中介性误读为虚指性“假相”生成机制。

语言文字与图像共同的中介性特征一定意义上悬置了学界反复争论的语图实指 / 虚指问题，因为两者在根本上有着近似的意义生成机制。这也就意味着，真正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是语图差异区分系统的异同问题。

1　参见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145。

2　参见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70。

Works Cited

Bradley, Arthur. *Derrida's Of Grammatology: An Edinburgh Philosophical Guide*.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8.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

[Hegel, G. W. F.. *Aesthetics* vol. 1.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年。

[Hegel, G. W. F.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I). Trans. He Lin and Wang Ji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79.]

Knapp, Steven and Walter Benn Michaels. "Against Theory." *Against Theory: Literary Studies and New Pragmatism*. Ed. W.J.T.Mitchell.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1985: 11-30.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明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Trans. Gao Mingk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赵敬鹏："再论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艺理论研究》5（2013）：156-162。

[Zhao Jingpeng. "A Further Reflection on the Real and Imaginary References of Language-Image Symbol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5 (2013): 156-162.]

赵宪章："文学成像的起源与可能"，《文艺研究》9（2014）：16-29。

[Zhao Xianzhang. "The Origin and Possibility of Literary Imaging."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9 (2014): 16-29.]

——："语图符号的实指与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文学评论》2（2012）：88-98。

[—. "The Real Reference and Virtual Reference of Language-Image Symbol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Images." *Literary Review* 2 (2012): 88-98.]

赵炎秋：《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

[Zhao Yanqiu.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riting and Im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21.]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Zong Baihua. *Strolling in Aesthetic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